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

百年大党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变化与演进*

吴童 张汉飞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就一直在探索和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以历史的时间线为视角,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分为农民运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农村改革及乡村振兴等四个阶段。梳理好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历史发展脉络,有助于持续而稳固地夯实“三农”压舱石作用。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征程,我们更有信心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农村改革;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5-0013-07 **收稿日期:**2021-04-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中美农业发展态势问题”(20BJY132)。

作者简介:吴童,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91)。

张汉飞,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农村工作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建设事业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党在完成各历史阶段的任务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各自时代特征的“乡村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诞生百年且执政70余年的大党,其在“三农”领域与时俱进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极其宝贵的。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历史发展脉络,有助于持续而稳固地夯实“三农”压舱石作用。

一、觉醒:农民运动

通常情况下,我们提到的乡村建设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身处内忧外患的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面临着兵祸匪乱、苛捐杂税、外国经济的侵略以及礼俗文化的崩坏等,农业经济也因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农村社会一片衰败。面对如此之颓势,一批满怀爱国热情的有志之士开始觉醒,试图以己之力挽救日趋于崩溃和破产的农村,提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种种主张与理论。他们纷纷深入

农村,在各地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比如梁漱溟等人的山东邹平实验、晏阳初等人的河北定县实验、卢作孚等人的北碚实验等,他们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

晏阳初把农民问题总结为“贫、愚、弱、私”,并认为解决农民这四个生活上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为此,他提出改造生活的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并采取“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教育方式^①。同时他也讲到,平教运动的目的在改造民族,挽救危亡,这是十多年来一贯的精神。识字运动、乡村建设、县政改革,都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梁漱溟则认为不应该把中国问题归结在“帝国主义与军阀”抑或在“贫、愚、弱、私”上。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②。也就是说,当时糟糕的内外部环境导致的社

会秩序崩溃(文化、礼俗崩坏)急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调和,但千余年来我们的社会构造又从未真正改变过,因此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而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呢?梁漱溟也做出了回答,即是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对此,他明确提出乡村建设是“救济乡村的运动、乡村自救的运动和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但最根本的还是“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因此,梁漱溟以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为依据,视一个乡为一个乡农学校,试图组织农民再造一个新的乡村社会。

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为救济日益恶化、濒临破产的农村,复兴农村迫在眉睫。1933年5月,“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由当时的国民政府牵头,开始对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农村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设立专门委员会对重要农产品的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推动设立农本局(负责经营农产、抵押、运销和仓库等业务)、推广改良种子、水利农具改良等。虽然当时的国民政府轰轰烈烈地推行复兴农村计划,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和梁漱溟等人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样,实际收效甚微。个中原因包括时代的局限性、脱离农村实际等。因此,最终不管是梁漱溟等人在各地推行的乡村建设实验,还是当时国民政府推行的相关政策,都被迫中止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相较于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围绕着“土地革命”所进行的农民运动和革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乡村建设的内容。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当时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并深刻认识到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和实现农民解放给予了高度重视。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大部分的国民革命运动其实就是农民运动^③。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但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下处于贫穷且无力

的状态。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明确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并对“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作了性质区分^④。这些阶级与我们先进的、进步的生产关系相悖,其存在使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而经济地位低下、生活清贫的农民,反而在运动中最富有革命性,更是我们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天然的同盟者。因此,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地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首要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广泛发动农民,与我党最可靠的、天然的同盟者一起开展农民运动。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民运动在国内许多地方掀起。到1927年,全国农业协会会员已达900万人。

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制定出指导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首先,通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问题说白了就是土地问题,只有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下,积极投身土地改革,把自己从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军阀的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获得土地和人身自由,最终取得“乡村革命运动”的胜利。虽然自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至新中国成立前,战争的阴霾一直笼罩这一时期,但乡村建设并未止步,中国共产党人依旧在延安边区和各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发展经济,力所能及地开展文化教育、妇女解放等乡村建设活动。抗战胜利后,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且作为民主革命主力军的农民对土地更加强烈的要求下,《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实施: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平均分配土地;贯彻群众路线,由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其次,通过乡村社会改造建立农民政权。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在农村政权建设问题上有了深刻的认识,提出了一切政权归农会、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抗日抗争期间的“三三制”,“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的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⑤。解放战争时期的“乡村人民代表制”“……只有基于

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⑥。

再次,通过发展乡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农民困难。当时的农村经济在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日益衰败,农业、手工业也日益衰落。中国共产党看清这一事实后依旧迎难而上,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尽一切可能进行经济建设即“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这“四大发展”构成了我们早期共产党人乡村经济建设的具体内容^⑦。

综上,对于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当时中国问题的本质(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自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的乡村建设开始真正觉醒了,这个觉醒的源头即是围绕着“土地革命”进行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激进”的乡村革命运动,虽然与温和改良主义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大不相同,相较于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而乡村不动”,中国共产党使乡村“动起来”了,也因此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支持和拥护,以此开启了探索乡村建设的新篇章。

二、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的国家才能实现完全独立。我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如若发展工业化必须从农业上打主意。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从农业的一般规律出发,充分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无产阶级革命若没有与农民的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⑧。他们从农业基础地位和工农联盟重要性的高度,强调正确处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依旧处在一个内部基础羸弱、外部环境差的特殊时期,为了进一步获得民族独立和发展保障,必须将农业发展放在第一位进而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加速发展工业化。

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开始转移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来,即如何发展农业,在保证有饭

吃的前提下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因此,我们党力图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个体经济向集体化经济转变,走一条集体化的道路。为此,除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构成了我们党在这一时期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很早就意识到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民运动”时期就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运动的积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通过土地改革,新中国3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奠定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土地改革也带动农村形成新的权力结构和阶级结构,新的乡村政治秩序建立了起来^⑨。土地改革虽然实现了农民千百年来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土地改革后,我们党从1951年起便积极提倡农业互助合作,开始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集体致富的道路。一是因为对于经济地位低下、生产条件落后的贫下中农来说,虽然他们通过土地改革开始拥有了土地,但是他们却缺少除土地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料。所以,如果不走互帮互助集体致富的道路,他们可能只能靠借高利贷或典当,出卖来之不易的土地过活,如此一来,土地革命便失去了意义。二是因为农业互助合作为发展生产、推广生产技术、兴修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事半功倍的方式,更能够满足国家的经济建设对农业生产的需求。

1953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一化”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⑩。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建设对农业生产的需求更大,且对农业生产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个体农民单打独斗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走农业合作化集体道路更加势在必行^⑪。尽管在1955年后期,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和速度有些“过急”,导致了一些问题,但整体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一次历史性胜利。因此,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既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⑧。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便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年出台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对社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资金、生产经营、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财务管理和收入分配、政治工作、文化福利事业、管理机构等9个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成为了指导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规性文件。紧接着,党中央也切实开展了一系列农村建设,全国上下形成一股开展新农村建设的热潮。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⑨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志还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提出了农业耕种的“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成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主要标志。“党在农村除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任务外,一方面从改革生产关系入手,通过土地革命、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生产关系变革,打破封建经济的束缚和小农经济的局限;另一方面,则通过兴修水利、农具改革、品种改良、发展化肥和农药等提高生产力的办法来促进农业增长。”^⑩这一时期其主要措施:一是加快集体化发展,即推行农业合作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化。二是加快农业发展,提出了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化学化等措施,以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党在建设新农村问题上也十分重视农村公共事业,重视农村环境和农民健康。

综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于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我们党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这一时期,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各个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77年的粮食产量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分别是

1949年的2.5倍和近4倍。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建设不同,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是基于我们国家政权稳定前提下实施的系统的改造乡村的方案。

三、改革:城乡结构重构

经历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时期,我们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且必须承认的是,我国农业发展得还是比较慢的,大多数农民的贫困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村经济不发展,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制的弊端日益凸显。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全国农村仍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占农业人口总数30.7%。当时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农村不稳定,何来整个国家政局的稳定?农村不摆脱贫困,整个国家又何来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⑪,人类其他一切社会活动都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为基础,并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而改变。基于为了吃饱饭的原动力,就出现了这么一批安徽小岗人,他们“不怕把天戳个窟窿”,签订“生死状”悄悄搞起了包干到户,走在了农村改革的前列。这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原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农村先行。农村改革的本质是给农民赋权,只有把自主权下放给农民和基层,农民和基层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农村的面貌才能得到彻底的改变。而摆在我们面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发展农业,因为农业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为了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彻底改变农村面貌,1979年9月28日,我们党提出了25项农业政策、农村经济政策和增产措施,并指出在抓紧实施好这些政策措施的基础上,要发展和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重点投资建设一批商品粮等基地,发展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现代化的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要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

村改革。改革开放促进了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和建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二元格局、启动城乡财税制度改革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改革。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成功为我们创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奇迹。随着“大包干”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全国上下形成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热潮,1979年到1984年农业连年丰收,1984年我们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粮食过剩。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成功改革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实现大幅度增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农民实现大幅度增收使得农村储蓄存款余额增加,意外又顺势地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劳动力和资金。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和商品生产的全面发展也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打开了市场流通的渠道。这样一来,乡镇企业充分利用了农村闲置劳动力和资金,不但更进一步地促进农民增收、农民就业和农村经济良好循环发展,而且为推动城镇化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随着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迅速发展,我们不再禁锢于“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二元格局,开始走上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改革开放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三农”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2000年前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农民生活水平停滞甚至落后。尽管从1978年到2000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巨大的提高,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同时期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依旧相差悬殊,且直到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还接近50%,而这一数值在城镇还不足40%。

面对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少和农村发展慢的问题,我们党实施了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等,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使得城乡割裂,农民囿于土地而被遗忘在国家工业化进程外,农业由于长期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也导致物质技术条件无法得到改善,因此在城市越来越繁荣发展的同时,农村却逐渐走

向没落,城乡发展开始严重失衡,差距悬殊。为此,胡锦涛同志在深入考察工农、城乡关系的发展后提出了“两个趋向”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进程的初始阶段存在一个普遍的趋向,即是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而随着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工业、城市则应该反过来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从而实现工农、城乡两个关系的协调发展,这是另一个普遍的趋向。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拉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序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这一新的时期是我们党开始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践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时期。国家接下来又连续出台了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农民增收”“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水利改革”“农业科技创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落实发展新理念”“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一系列聚焦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并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乡村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得到明显改善,农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201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较2004年翻了两番;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4年的47.2%下降至32.2%,且与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越来越接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见证农村发展阶段和水平的一个动态过程,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当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也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的理论政策。这一时期一系列的农村改革解决了如何实现农村快速发展的问題,为乡村建设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四、复兴:乡村振兴战略

在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觉醒于“农民运动”、探索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选择于“农村改革”、复兴于“乡村振兴”。但无论是哪一个阶段,其最终都是聚焦于如何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继续坚持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大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政策扶持,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基于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三农”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继承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乡村建设”思想,同时它也是指导乡村建设实践的国家顶层设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指出“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⑥。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一是我国农村发展水平还比较低,2016年,全国整体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3821元,而农村仅为12363元,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二是我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2016年,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6308元扩大到21253元。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过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因此,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一科学判断来看,乡村振兴战略即是在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后对如何建设乡村从而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首先,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比,乡村振兴战略继承和发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提出的20字要求,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除了“乡风文明”没有改变外,其他四个方面均进行了内容“升级”。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体现了我们党对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体系的进一步挖掘;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表达了我们党想让而且有底气能让农民富起来的强烈愿望;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突出了我们党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农村治理有效和可持续的要求。

其次,乡村振兴战略凸显了对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重视。过去我们因为工业化大力发展经济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乡村”^⑦。生态振兴贯穿于乡村五大振兴(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实现的全过程,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现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为解决贫困问题而奋斗。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和前提。虽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仅有一字之差,但它不仅把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更加具体生动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而且还让我们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了明确的盼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的短板,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而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贫困地区。因此,2013年,我们党提出了精准扶贫,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重点部署,聚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虽然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脱贫攻坚战的收官增加了难度,但我们党依旧以最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带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从此解决了困扰我们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完成为我们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并把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摆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⑧。在“十四五”建议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提出既是对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又是对历史上乡村建设活动经验的传承,即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创新。当前,我们已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稳步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推进村

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5年行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等8个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举措,为建设好乡村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⑩。与之前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同,此次“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次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充分展现了“十四五”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着力点,即在公共设施建设、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人居环境整治等卯足劲、做足功,搞好乡村建设,形成城乡大市场互进互促的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明确提出,既开启了百年乡村建设的征程,又是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两者有机衔接的保障。从农民运动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到农村改革再到乡村振兴,虽然并没有专门以乡村建设作为关键字眼,但实际上正是这四个阶段构成了我国的乡村建设全过程。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征程,回顾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为我们党接下来的“三农”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不仅是过去百年更是未来我们党长期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只有建设好乡村,我们才能不辜负亿万农

民百年来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党才能真正做到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注释

- ①晏阳初:《定县的实验(节选)》,《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年第5期。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③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41页。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1—74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8页。⑦郭海霞、王景新:《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4页。⑨慕良泽、赵勇:《中国共产党“三农”战略:百年回溯与展望》,《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3期。⑩⑪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年2月。⑬《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页。⑭王伟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8页。⑯习近平:《决胜全面坚持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国合作经济》2013年第2期。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年2月22日。

The Change and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Big Party in the Past Century

Wu Tong Zhang Hanfei

Abstract: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21,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exploring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timeline, the 100-year r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peasant movement”, “agricultural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co-operation”, “rural reform” and “village revitalization”.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entury-old rural construction thinking and practice will help to continuously and steadily consolidate the role of the “ballast stone”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journe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entury-old rural construction, we are more confident in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asant Movement; Agricultural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Co-operation; Rural Reform;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晓 力)